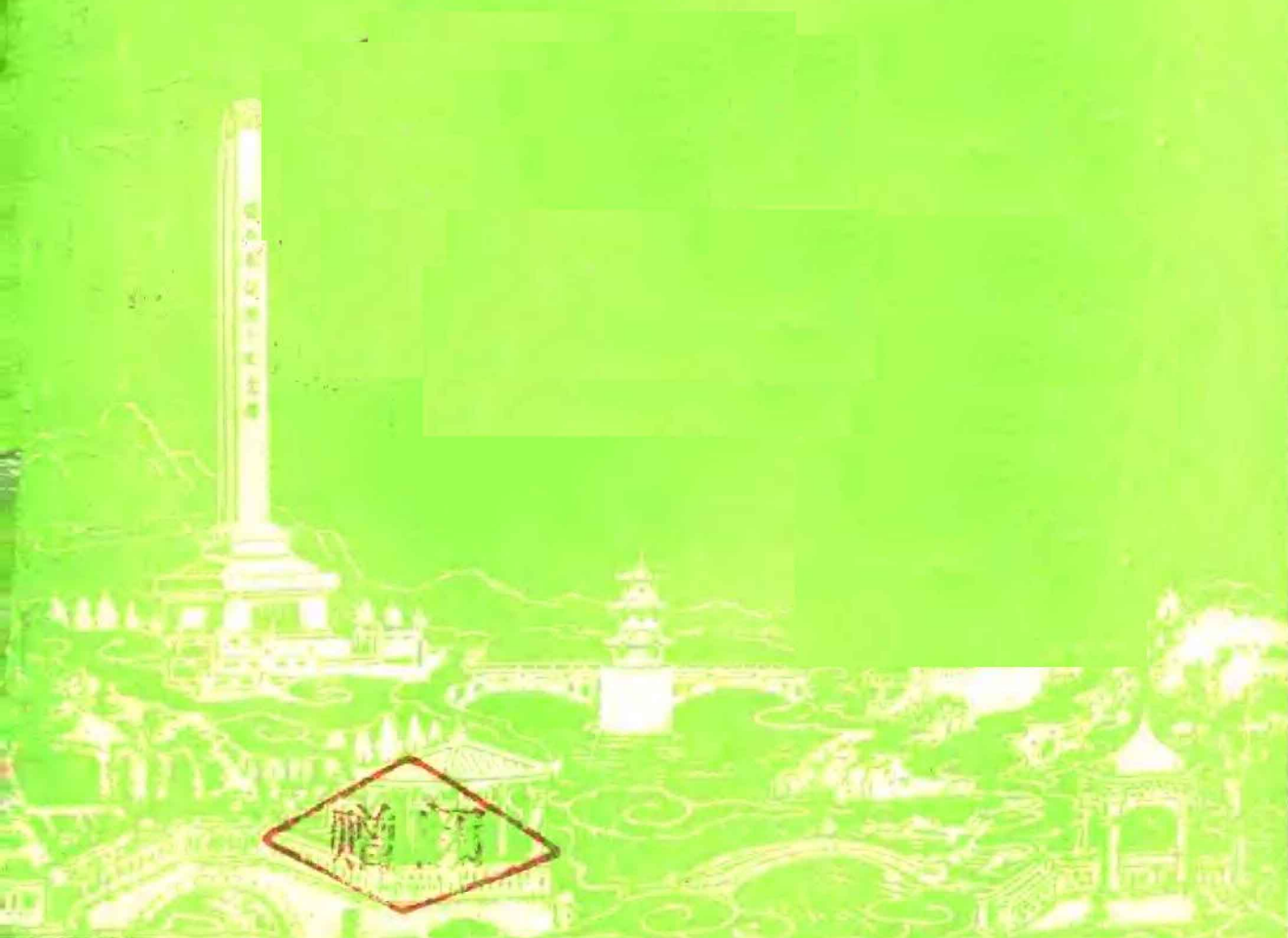


13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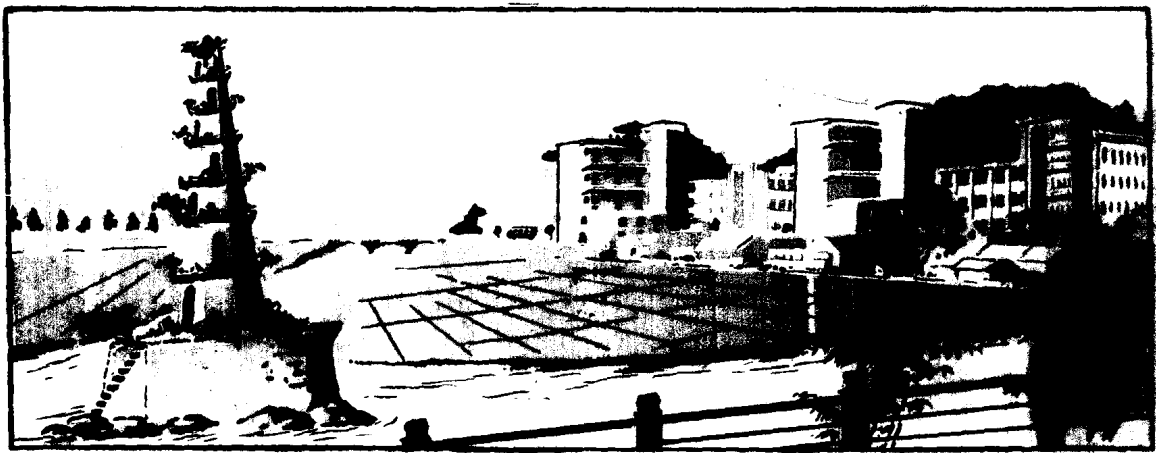
龙岩文史资料

第六期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龙岩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



古塔映新晖

连永泉

龙岩文史资料

第六期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

编辑：龙岩文史征委会编撰组

出版：政协龙岩市委员会

印刷：龙岩地区印刷厂

目 录

深切怀念闽西特委书记王涛同志·····	魏金水 (1)
在邓部长领导下工作·····	罗金泉 (5)
回忆陈柏生·····	潭珊英 (13)
山塘村斗争史·····	林斯桔 (17)
白皮红心·····	陈殿南 (20)

闽西土改经验的创造总结和推广·····	邱林忠 (25)
岩平宁政治监察署与张旭高·····	郭 翔 陈仙海 (36)
土地革命初期的群众武装·····	林定煌 (40)
一九二八年三月四日是龙岩后田暴动的准确日期·····	郑学秋 (42)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前期的龙岩店员工会·····	邱庆炎 (45)

英烈志 张双铭 郭成柱 陈庆云 张木良 吴荣光 吴仁海	
·····陈仙海 郭荣茂 郑学秋 吴良宝 张大英等整理	(52)

岩侨史略·····	张汉城 (68)
在南洋 ^教 的岩侨·····	陈小章 (70)
龙岩解放前夕的政治情况 (下) ·····	李伟夫 (71)

地方人物志

王源 石应岳·····	郭义山 (82)
黄浦军校毕业的龙岩人·····	翁九如 (88)
封底：古塔映新晖·····	连永泉

(内部资料)

深切怀念闽西特委书记王涛同志

· 魏金水 ·

正当全国掀起学习、宣传、贯彻十二大文件，振奋精神，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之际，我心潮澎湃，思绪万千。忆昔思今，往事历历在目。在那漫长而又艰苦的战斗年代里，无数党的优秀干部，为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历尽千辛万苦，英勇奋斗，前仆后继，流血牺牲，才换来了今天的幸福生活。我的好战友王涛烈士，就是其中的一个。

一九四〇年冬，党中央为了加强南方各革命根据地的领导，深入开展敌后游击战和抗日救亡运动，从延安特派王涛同志来福建任闽西特委书记。他服从组织的需要，不辞艰辛，跋涉万里来到闽西山区，在极端艰难、复杂、尖锐的阶级斗争环境中，领导闽西人民，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但不幸得很，一九四一年农历八月十三日，因叛徒的出卖，受敌突然袭击，壮烈牺牲。王涛同志离开我们虽已四十二年了，但他那精明能干，沉着勇敢，谦虚谨慎，平易近人，关心群众，真诚待人和对革命事业坚定不移的信念，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至今记忆犹新。

王涛同志，湖南湘潭人，知识分子出身。他于大革命时期就参加了革命，在湖南湘潭、长沙等地从事领导学生运动，宣传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促进国共两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当北伐军向江西、湖南、湖北进军时，他积极发动各阶层人民，团结各方面力量，支援北伐军，打倒北洋军阀吴佩孚，建立以武汉为中心的国民革命政府。一九二七年“七·一五”蒋汪合流反共，致使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党派他去苏联东方大学学习，苏维埃初期回国，在上海党中央工作一段时间后，便调到广东东江任十一军红

军学校校长，从事训练培养党的军事干部，致力提高红军的政治军事素质。一九三一年红十一军奉命开入福建与红十二军合编后，他被调回湖南从事党的地方组织建设工作，前后任过特委书记等职。一九三四年主力红军长征过湖南时，他又被调去随同红军长征，在红一方面军任工作队长，负责沿途的群众工作，传播革命种子。红一方面军到达四川时，因工作需要，又调去四方面军参加开展反张国焘的分裂红军斗争。他在这场斗争中，既能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地开展斗争，又能耐心细致地做说服教育工作，团结同志，坚决拥护党中央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坚持北上抗日。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因他有丰富的地方工作经验，党组织又派他去从事地方政权建设工作，前后担任过县革命委员会主席、秘书长等职。一九三七年国共两党合作抗日，他奉命回湖南收集整顿各地方游击队，发动各阶层人士，投入抗日，建立广泛的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并任我党公开代表，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以后又调往武汉负责抗日民主运动。在这期间，他一方面正确地执行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组织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团体和宣传队，深入工厂、农村、机关、学校和工商界，宣传我党的抗日政策，动员一切抗日民主力量，团结一致抗日；另一方面，他对那些民族败类、国民党顽固派及汉奸则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无情地揭露他们卖国求荣的可耻行径，对抗日救亡运动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一九四〇年冬，王涛同志奉党中央之命，与他爱人张志芳同志一起，历尽千辛万苦，千里迢迢来到闽西，担任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委员兼闽西特委书记。当他俩到达闽西特委机关驻地——龙岩后田村不久，闽西国民党反动派追随其主子蒋介石，于“皖南事变”的第三天，也疯狂地发动了“闽西事变”，公开反共反人民，调遣大批武装向闽西特委和各县委机关驻地进攻，大肆捕杀共产党员、游击队员和革命群众，一时白色恐怖笼罩闽西大地。在形势十分恶劣情况下，王涛同志虽然到任不久，情况还不很熟悉，但他沉着稳重，胆大心细，一

而机智勇敢地组织革命武装反击敌人的反革命进攻；一面则妥善地，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撤退，将各机关隐蔽到深山密林中，以免在敌强我弱的不利形势下遭受损失，积极保存有生力量。“闽西事变”后，敌人虽然调集了大批人马，到处跟踪追击，进行猖狂的围剿，但我党在王涛同志的领导下，没有受到什么大的损失，而同志们的革命意志却更加坚强起来。王涛同志考虑到要与敌人坚持长期的斗争，以少胜多，首先必须提高大家的政治军事素质，坚定革命必胜的信念，因此，尽管当时敌情紧张，环境恶劣，战斗频繁，机关经常转移，他仍利用战斗空隙，办起政治军事训练班，亲自任教官，坚持给大家上政治军事课，进行军事训练。同时，他考虑到将来建设社会主义的需要，又增设了文化课，特地派阿兰同志教大家识字写字。当时，机关里许多同志战士出身贫苦，没读过书，年纪又大，学起来很吃力；另方面对学习文化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于是，常借口去拾柴或摘野菜，逃避上文化课。王涛同志发现后，并没责怪同志们，而总是耐心说服，谆谆引导，反复说明学习文化的重要性。他常把陈水锦、戴炳辉两人叫来，态度和蔼地劝导他俩说：“你们去拾柴是好的，但学习文化也很重要，现在能打仗就行了，可是将来建设社会主义没有文化，是寸步难行的，你两人是班长，应该带头刻苦学文化，掌握科学文化知识，怎么可以带大家去拾柴，逃避学文化呢？”他二人深受启发教育，感到王涛同志政治远见高。

王涛同志虽是个知识分子，但却没有一点知识分子的架子，与同志们亲密无间，对下属是无微不至的关心，同志若有什么困难或生病了，他总是象亲父兄一样，关怀备至，经常到同志们住地谈心。有一次戴炳辉同志生病了，他一天连来三次看望，并叫炊事员尽量设法做较好的饭菜，他亲自端来，炳辉同志感动得热泪盈眶。正是这样，同志们在他亲切的教育和严格要求下，不仅提高了政治觉悟和军事知识，同时也提高了文化水平，革命斗志日益旺盛。

一九四一年农历八月十三日上午，正当王涛同志在龙岩马坑与合

溪交界背后的深山油房坑特委驻地，向同志们讲授军事课时，叛徒带着保安团搜索到对面山上，一发现就立即开枪扫射，王涛同志当场牺牲。张志芳同志见他倒在血泊里，心如刀割，强忍悲痛，冒着密集的铁弹，冲到烈士身边，从口袋里取出文件遗物，又迅即转回山寨，背上公文箱，一手扶着正在生病发高烧的陈水锦同志，一手持着短枪，随着同志们英勇冲出来。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但同志们并没有惊慌失措。特委宣传部长陈卜人同志果断地挑起指挥的重担，组织一部分同志抢占有利地形，英勇反击，掩护大部分同志向中甲方向转移。

这一事件发生前，我带着工作队在岩、漳交界一带开展新区工作，闻讯立即从永福赶回来接应，在群众的紧密配合下，经过几天的联络寻找，终于把冲散的同志集合起来，在中甲马山附近的山坑里，重建特委机关，我代书记，安定了大家的情绪，继续开展斗争。为了安慰先烈，保证革命后代的安全，我们派人把王涛同志早先秘密寄托在条围乡一个接头户家中抚养的幼儿，送往广东梅县一个地下党家里护养。王涛同志的爱人张志芳同志，表现得非常坚强，她强忍着失去爱人和战友的痛苦，与我们一起爬山越岭，行军作战，餐风宿露，有时走百余里山路，她从未叫苦，有时还帮助男同志们洗衣缝补，对革命事业充满信心，实在令人敬佩。不久，因工作需要调去梅县中心县委，以后又转去南委机关工作。（解放后她曾任云南省水电厅长。其儿子参军在海南岛某部海军工作。为了感谢梅县和龙岩两位养母的养育之恩，同时也为了看望同他父亲共患难、同生死，并肩战斗过的老同志，曾两度来到粤东和福建看望大家。）

王涛同志在闽西工作时间虽不很长，但他那对工作认真负责，沉着果断，不畏艰难困苦，生活朴素，刻苦学习，不耻下问，没有一点知识分子的架子，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给大家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王涛同志的牺牲，是闽西党的一大损失，我们万分悲痛。这悲痛终于化成了战无不胜的力量。一九四四年十月，中共闽西特委为了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猖狂进攻，开展自卫武装斗争，决

定在各地原武装经济工作队基础上扩大成立一支闽西武装。同志们为了纪念这位为闽西人民解放事业贡献宝贵生命、洒下鲜血的前特委书记、党的优秀组织者领导者王涛同志，把这一武装队伍命名为“王涛支队”。它象三年游击战时期的“红八团”一样，活跃在闽粤赣广大边区，声东击西，神出鬼没，频传捷报。队伍在战斗中不断发展壮大，终于扩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闽粤赣边区纵队”，配合南下大军，解放了粤东和闽西南的广大地区。

王涛同志为之奋斗的崇高理想已经实现和正在实现着。今天，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党的十二大制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同心同德，团结一致，一定能无愧于先烈，无愧于时代，一定要取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面实现。

（陈仙海整理）

在邓部长领导下工作

罗金泉

（郭义山整理）

编者按：罗金泉先生，龙岩湖邦公社龙门大队人。现年六十七岁。一九三〇——一九三五年参加工农红军，历任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财政部记账员、会计科长，中央巡视员、供给处主任等职。列席过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三五年三月，罗在闽粤赣边区与国民党军队作战中被俘。从此脱离革命，并被收编入国民党军队，历任班排连长、龙岩县自卫队中队长等职。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二日罗率县自卫队二中队在适中新祠参加章汤铭起义，并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闽西义勇军龙岩支队副支队长。

罗于一九三二至三四年间在邓子恢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近二年。邓子恢同志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六年两度回故乡龙岩，都曾亲切接见了罗金泉先生。

下面是罗金泉先生对邓子恢同志在瑞金中央财政部工作时的片断回忆。

一九二八年，我十四五岁，在龙岩下井巷广益京果海货店当学徒。一九二九年红四军入闽，攻克龙岩城，工农翻了身，我加入学徒

工会，并参加工人纠察队。一九三〇年由工人纠察队编入红军模范连，为保卫红色政权而战斗。一九三一年三月又由模范连选送到中国工农红军学校彭杨第三分校政治大队（校长肖劲光，政治大队长杨遇春，校址在永定虎岗）学习。

一九三一年六月八日，红校学员配合当地赤卫队攻打芦丰钟少奎匪军团部，战斗中我负了重伤，被送往红军医院。一九三二年春伤愈后，在福建军区后方留守处任收发工作。同年六月由张令彬、李灿香同志介绍，加入共青团，不久任团支书，后又转入共产党。同年冬，我调往长汀县城，在红十二军医院政治处工作。就在这里，一次偶然的机缘，使我有幸认识邓子恢部长，并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近二年之久。

一、初识邓部长

一九三二年冬，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同志，代表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来到长汀红十二军医院慰问伤病员，并发放抚恤金和红军公谷费。每位重伤员可得抚恤金银元五十，中伤员可得银元三十，轻伤员得银元十五。当时我作为红十二军医院政治处工作人员，有幸协助毛泽民同志工作，因而认识毛泽民同志。有一次，毛泽民同志询问了我的家世和简历后，跟我说：

“小鬼！中华苏维埃政府财政部刚组建不久，很需要人。邓子恢同志已被任命为部长，我介绍你到中央财政部工作好不好？”

邓子恢同志在我们闽西，是声名赫赫的革命领袖，我早就敬仰他。毛泽民同志要介绍我到他身边工作，这是莫大荣幸，所以我立即满口答应。

不几天，毛泽民同志交给我一张他亲笔写的介绍信。拿了介绍信，我立即晓行夜宿，步行到瑞金叶坪，找到中央财政部。当时财政部和国家银行共用一座二层楼房。楼下是国家银行，楼上是财政部。

我来到这座楼房门口，接待我的是一位女同志（后来才知道她就

是邓子恢的爱人黄秀香，国家银行的职工），他问我：“哪里来的？找谁？”我作了回答，并拿出介绍信。她看了介绍信，朝上向我指指：

“就在楼上。”

到了楼上，一个中年人健步朝我走来，笑问我：“小鬼，你找谁？”我说要找邓部长，并拿出毛泽民同志的介绍信。

“我就是邓子恢！”邓部长看了介绍信，笑嘻嘻地摸摸我的头，问我年龄和其他情况，我一一作了回答。部长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初来时要见大首长的惴惴不安的心情，顿时烟消云散。

之后，部长又亲自为我安排食宿，并叫我先休息休息。并叫来一个老头子，说：

“老头子，这是你的徒弟，你以后带带他。”

这个老头子，就是财政部会计陈寄今同志，龙岩小池人。当时财政部总共只有五人，除邓部长、陈会计外，还有永定人王益哉任总务，龙岩白土人李再南任勤杂，我任记账员。

财政部除办公室外，还有四间住房：邓部长同她家属住一间，陈寄今同他家属住一间，王益哉、李再南共住一间，我同国家银行的曹菊如、丘成相、曹雨声四人同住一间。

从此，我就在邓部长直接领导下工作。

二、人穷志不短

我来到财政部时，正值国民党反动派集中几十万兵力，对中央苏区疯狂发动第四次反革命“围剿”。当时苏区财政部经济十分困难，生活极端艰苦。

我刚来没几天，邓部长就用龙岩土话问我：

“港脚（按：这是龙岩人对老熟人老朋友的爱称，我也不知邓部长从什么时候开始，就一直这样称呼我），在这儿生活过得惯吗？”

我坦率地说：“其他还好，就是这里的菜没放盐。”

部长笑着向我作了解释。原来反动派“围剿”我们苏区，沿海食

盐运不来。好容易弄到的一点食盐，一律都支援前方将士。至于后方，上至苏维埃中央政府的主席，下至一般的公务员，都不吃盐，或吃老墙土煎熬出来的硝盐（这种盐煮菜，其苦无比）。邓部长最后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

“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前方将士正在流血牺牲，我们后方少吃点盐算得了什么？人穷志不短。我们要节省每一两米，每一粒盐支援前线！”

部长的一席话，说得我们热呼呼的。是的，连毛委员、朱老总，还有张闻天、瞿秋白、林伯渠，何叔衡等中央领导都穿同我们一样的衣服，吃同我们一样的伙食，跟我们同甘苦，共患难，我们年青人吃点苦又算得了什么？

邓部长一天到晚忙于工作，生活上很随便，跟我们普通工作人员打成一片。他虽然有家，但从不开小灶，同我们一样吃食堂，每顿领一个定量很少的饭包，吃一碟无盐或硝盐的菜。他还给我们介绍一种食盐的代用品——豆豉、辣椒和大蒜研成的三合酱，说这可调味。我们试着这样做了吃，果然味道不错。

夏天到来了。一次闲谈中，部长又问起我近来的生活情况。我向部长诉苦说：“蚊子咬得人睡不着觉！”部长说：

“港脚，我教你：你可以糊‘灵厝’啊！”（灵厝，龙岩方言，就是为死人糊的纸房子）。

邓部长是教我：如没有纱布蚊帐，可用纸糊蚊帐代替，他以前打游击时就是如此。我果然和我的同铺李钦成一起，试着糊了一顶纸蚊帐，为了让纸蚊帐能透气，我又来一点创造，就是用炷香在纸蚊帐上烧出一个个小洞洞。后来，我发现许多同志都象我一样，使用这种纸蚊帐，而邓部长的蚊帐虽是纱布的，但已百孔千疮，也是用纸来修补。

在苏区，烧的柴草也成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邓部长建议开小煤窑，并亲自带领我们去找煤矿，后来我们财政部在沙洲坝后山第一个找到煤，开办了苏区干部第一个小煤窑，初步解决了缺柴烧的问

题。

邓部长还带领我们开荒种菜。他以身作则，卷起裤管，打着赤脚，同我们一道种菜、浇菜，弥补了财政部食堂青菜供应的不足，改善了我们的生活。

在苏区，我们的物质生活如此贫乏，犹如乞丐。但在邓部长影响教育下，我们在精神生活方面又是富翁，共产主义的理想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鼓舞激励着我们，使我们经受了生活上各种严峻的考验。

三、一丝不苟

邓子恢同志是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时，被任命为人民委员兼财政部长的。他一九三二年六月到任后，立即采取各种措施，为扭转苏区财政的困难局面而斗争。为统一苏区财政，财政部发出十二号通令，统一会计制度，建立国库制度，制定暂行国库条例、会计规则和会计课目表等。邓部长还主持开办金库训练班、财政人员训练班，召开省、县财政和银行负责人会议。这些有力措施，保证了中央财政经济的稳定，有力地支援了红军反“围剿”斗争。

邓部长平易近人，在生活上同我们打成一片。工作上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对我们要求十分严格。他经常检查我们的账目，及时纠正我们的差错，不愧为理财的专家。

即使是一个数目字的写法，也叮咛再三，不容许我们有任何差错。他要求我们在盖骑缝章处的数码必用大写，而且要用毛笔写在骑缝的正中，如“六”，就得规规矩矩地写作“陆”。他叮嘱我们，阿拉伯码一定要写清楚，不得模棱两可。他根据过去记账的经验和教训，制定了一套用阿拉伯码记账的书写规则，我们大家都得遵守，违反了是要挨批的。

我当时年轻好动。看到人家学无线电发报，看到医务班学员在学打针，或是看到文工团员在唱歌跳舞，心里总是痒痒的，几次都跟部

长闹着要去学学，试试。部长总是耐心地做我的思想工作，要我安心搞好本职业务。但对唱歌跳舞，他认为将来做宣传工作用得上，批准我去学了一星期。

一九三三年夏，临时中央政府由叶坪搬到沙洲坝。根据工作的需要，中央财政部工作人员由开头的五人，逐步增加到一百多人。财政部下设国库管理局、没收征发局、公债管理局、会计局。陈寄今任国库管理局长，邓子恢兼任没收征发局长，许文亮任公债管理局长，曹菊如兼任会计局长。当时，我被提拔任没收征发局会计科长。这时候，邓部长对我要求更高了。

当时规定，工作人员不得抽烟、喝酒，不得同群众谈恋爱。有一次，我在财政部后门一个小姑娘摆的小摊子上，买了一碗酒和几个铜板的花生，一边吃，一边同小姑娘说说笑笑。这件事，以后让邓部长知道了，结果我挨了一顿狠狠的批评，他还要我在财政部全体工作人员会议上公开检讨。会后，部长怕我想不通，又耐心跟我谈心，指出革命战士遵守革命纪律的重要性。这是邓部长对我最严厉的一次批评，通过这次批评，我的自由散漫的习气从此得到较好的克服。

四、忍辱负重 鞠躬尽瘁

一九三三年初，王明路线控制的党中央从上海迁到瑞金，加紧推行其“左”倾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路线。邓部长跟毛泽东同志一起遭到王明路线的排斥打击。一九三三年夏，他遭到公开的批判斗争，并被撤去财政部长职务，降职为副部长（正部长由林伯渠同志担任）。邓部长遭到如此打击后，仍忍辱负重，毫无怨言，继续致力于苏区财政经济工作。

那时财政部的具体领导工作仍然是邓部长在主持。为了克服苏区财政困难，经中央批准，中央财政部在一九三三年发行了五百万元公债。为保证完成公债发行任务，邓部长要财政部全体工作人员都来做发行公债的宣传员和鼓动员。

他说：我们做宣传工作，要讲到群众会哭会笑。诉旧社会苦，要能使群众哭；讲工农翻身的甜，要能使群众笑。为此，他曾经在瑞金附近的壬田乡召开的一次购买公债动员大会上，为我们做了示范。他用刚学会的方言（客话，但中间夹带着龙岩话）做报告，收到很好的效果，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伟气魄和非凡的组织才能和鼓动能力。由于邓部长的宣传鼓动，这个乡村不惜一切牺牲，争先恐后超额完成了公债购买任务。

为了完成公债购买任务，邓部长还要求我们党团员起模范带头作用。我们实行供给制，没有工资收入，但每月约有四角钱的伙食尾子。为了支援前方，我们节省每一个铜板，几乎把每月领到的伙食尾子全都买了公债，邓部长当然也不例外。

那时，共青团还发动了星期六共产主义义务劳动，帮助红军家属耕田。这虽不是邓部长的份内事。但他也积极带动，把财政部工作人员分成小组，并同我们一起，高唱“共产青年团，发起星期六，帮助红军家属来耕田”的革命歌曲，奔赴各地，为红属耕田、挑水、挑柴炭。为“扩红”工作做出了极大贡献。

在严重的战争环境中，为进一步扩大财源，应付日益增加的军费开支，征得中央同意，财政部决定加强没收征发工作。

一九三三年底的一天早晨，邓部长召开了财政部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他半坐在办公桌面上向我们讲革命形势，谈财政经济面临的困难局面。他说：国家财政收支不平衡，我们是有责任的。我们已提请中央批准：由我们财政部组成一个随军没收征发工作团，为革命筹款。这个没收征发工作团由李六如同志负责。接着邓部长在会上用龙岩话问我：

“港脚，你去不去啊？”我当时很想到前方打仗，当然愿意去。最后由李六如、我、郑××等几人组成没收征发工作团。

邓部长为我们这个工作团布置的任务是：随红军打沙县卢兴邦匪部，时间一个月，筹款一百万元。随后再攻打永安卢兴荣匪部，时间

一星期，筹款三十万元。这个任务是硬任务，不能打折扣。

一九三四年一月五日，我们从瑞金沙洲坝出发，经宁化、清流、归化，于一月十五日到达沙县南门外，与正在准备攻打沙县的红一军团取得联系。后红一军团奉命去打来援之敌，攻打沙县城的任务由红三军团（彭德怀任军团长）负责。一月二十八日，沙县县城为我红军攻克，消灭卢兴邦两个团，俘虏近五百人，缴获的胜利品很多。为此由闽西、江西群众组成的近千人的运输队，日夜赶运盐巴、布匹、西药、五金器材等胜利品到中央苏区。这支运输队足足挑运了近二十天之久。

我们随军没收征发工作团在沙县城攻克后，立即在三军团地方工作部协助下，开展没收征发工作，截止二月二十八日我红军撤出沙县城，这一个月我们胜利完成了筹款一百万元的任务，并向邓部长做了汇报。

一九三四年四月，我们又随红七军团（军团长寻淮洲）攻进永安县城，消灭卢兴荣匪部，缴获大量武器物质，并在红七军团地方工作部配合下，一星期即筹款三十余万元。

一九三四年八月，我们奉命将征集到的一百三十多万元巨款解往中央。为保证解款安全，中央警卫团专门组成接运部队，在红五军团协助下，这笔通过艰苦奋战筹集到的巨款终于如数、安全地解到中央金库。后来这笔巨款在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红军主力被迫于一九三四年十月开始长征时，发挥了巨大作用。使参加长征的红军指战员和中央各机关干部每人都能分得五到十银元，另加铜板一百枚，以敷长征路上急需。

一九三四年八月底，中央又成立了一个由保卫局、财政部等单位组成的巡视工作团，到赣南、粤赣等军区巡视检查工作。我受邓部长委任，代表财政部参加巡视工作团为巡视员。这个巡视工作团的任务：一是了解各省（军区）分金库库存现金情况，并要求从速将库存现金解往中央金库；二是从速处理各地在押囚犯，该杀的杀、该放的

放，以适应时局变化。接受任务后，我们立即前往赣南军区所在地于都巡视。

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日，我在赣南军区第三分区（驻登贤县）巡视检查工作时，突接由林伯渠、邓子恢两部长署名的加急电报：

“金泉同志：电至之日，速还本部，另有任用。林邓。”

接电后，略作安排，我即带警卫员匆匆赶赴瑞金。到了会昌，得知因情况紧迫，林邓两部长及中央政府机关早已撤离瑞金，去向不明。从此，我成了离群的孤雁，不得不折回赣南军区，跟随赣南军区司令员蔡会文，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领导的红军队伍，并被委任为赣南二支队供给处主任。我们这支队伍奉命担当后卫，掩护主力红军北上抗日。

完成掩护任务后，我们这支队伍在敌人重重围困下，损失惨重，成了孤军，不得不遣散伤病员，化整为零。在极艰难困苦的环境下辗转战斗。我所在的一支小分队四十多人终于一九三五年三月十八日在赣南登贤县小溪一带遭敌人围困，弹尽援绝，兵败被俘。

我从一九三二年冬始，在邓部长身边工作，至一九三四年十月不幸离散，前后近两年。邓部长崇高的人格，卓绝的才干，对我严父般的关怀和培养，令我永志难忘。兹届邓部长逝世十周年纪念，谨就记忆所及，书如上述，以表怀念之情。

回忆陈柏生

谭珊英

陈柏生又名陈碧星，福建省龙岩县后田乡人。他父亲陈凤岐继承祖业在广州与人合股经营烟丝业，但经营情况每况愈下。陈柏生于一九一〇年生于广州。一九二五年在福建厦门集美中学读书时就积极参加各种革命活动，加入了共青团。他一心追求真理，投身革命，放弃

继续求学深造的机会，回到龙岩从事革命活动。一九二七年一月加入了共产党，是龙岩党发展的第一批知识分子党员之一。邓子恢同志当年在龙岩领导农民运动，非常重视他，称赞“陈柏生思想很纯洁，也很聪明能干。”一九二七年冬，中共福建省委和共青团福建省委在漳州同时成立。团省委成立后机关设在厦门，孟谦（孟用潜）任书记，陈柏生任宣传部长。一九二八年四月间，孟谦与党的省委书记罗明一同离开厦门经上海去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和共青团“五大”，陈柏生代理团省委书记，一九二九年一月正式任团省委书记。接着陈柏生与罗明一同到闽西苏区巡视工作，回厦门后又到福州巡视工作，在福州被捕，经同志们多方营救，不久释放回厦门，继续主持团省委的领导工作。三〇年三月初在第二次省团代表大会上仍当选为团省委书记。三月十八日，团省委组织青年学生在厦门中山公园召开纪念“三·一八”大会（即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段祺瑞在北京狮子胡同居杀请愿学生四周年的纪念大会），同时庆祝“三·一八”巴黎公社纪念日，以宣传党的号召，揭露敌人的残暴，向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由于叛徒告密，在这次集会前后，陈柏生等十八名党的和非党的重要干部被捕。一九三〇年五月，在中共福建省委的领导下，由省军委负责人陶铸同志负责组织和指挥，打开监牢，劫狱成功，陈柏生和党的厦门市委书记刘端生等同志四十多人被营救出来，送往闽西苏区。当时我在省军委工作，与陶铸同志住在一起，以掩护机关，担任省委内部交通、文书等工作。陈柏生到闽西不久即调到上海在团中央工作，并被派到满州里（当时称为满州省委，即今天的东北三省）巡视工作。他回上海后，我也调到上海，在沪西纱厂做地下工作。我于一九三〇年底与陈柏生认识。因为在厦门劫狱前常听到陶铸同志谈起陈柏生的情况，所以一见如故，很快就在工作联系中建立了感情，不久我们就由同志结成了夫妻。但因工作关系婚后我们连个简陋的家都没有。陈柏生天天开会，住在旅馆，我则在纱厂附近和别人挤在小亭子里住，只能抽空到旅馆去见他。他知道我参加革命的时间不长，见